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研究参考

第 10 号（总 202 号）

2015 年 6 月 23 日

---

###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与收益保障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但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一直都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且由于对国外投资环境不够了解，一些海外项目出现亏损。基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网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与收益保障”文津圆桌研讨会，邀请相关部门的领导与专家一起探讨更为有效的投融资方式和收益保障措施。

本期研究参考是与会各位专家的观点综述。

**关键词：**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收益保障

#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与收益保障

##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是否过快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商务参赞周振成介绍，2002-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从27亿美元增长到1160亿美元，13年间增长了近43倍。对外投资的世界排名从第26位上升到第3位。截止到2014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776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和机构超过3万家，境外形成的资产规模达到3万亿美元。2014年全年口径的投资达到了1160亿美元，吸引外资的总体水平是1195.6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和吸引外资的差异只有35.6亿美元。可以预测2015年或者未来很短一段时间，对外投资会超过吸引外资的水平。另外，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也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对外工程项目新签合同额为1917.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424亿美元。截止到2014年底，国外累计签订合同额1.4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351.6亿美元。在对外劳务合作方面，去年派出50多万人，年末在境外的总人数超过100万人。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增速是否过快，是否会浪费资金，造成重大损失，部分专家表示担忧。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王跃生认为，尽管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很大，但还很不成熟。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企业“走出去”的增速能像中国这么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存在风险。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投资的特点可以用三个高来概括。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占比高。二是能源、金融、基础设施等基础性领域占比高。据统计，2014年中国企业参加348个国外铁路项目，比2013年多了113个。这些基础性领域的投资需求非常大，周期长，很容易被套牢。三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比高。虽然从企业数量上来看是民营企业多，但从投资量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占比高。这三个高是相互关联的，一些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了基础产业，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较大风险，所以我国企业的国际化面临很大挑战。

而另一部分专家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迅猛增长予以积极的肯

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认为，从宏观指标来判断，中国没有在对外投资方面走得太快。首先，从对外投资相对于对内投资的存量来看，中国不但远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其次，从对外投资的存量相对于 GDP 的规模来看，世界的平均水平是 3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17%，而中国只有 6.5%。赵晋平和周振成一一致认为，“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新常态，可以归纳出五个方面的积极作用：（1）是在全球配置经济发展资源的重要方式；（2）是培育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3）能够拓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激发新的增长动力；（4）可以成为我国加强和周边国家以及主要合作伙伴的重要纽带；（5）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重要手段。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我国对外投资的迅猛增长是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2011 年美国亚洲协会曾发布名为《美国的门户开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最大化》的研究报告，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将要达到 1 至 2 万亿美元。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已累计达到了 7760 万亿美元，按照现在每年一千多亿的增长速度，到 2020 年可以达到 1.4 万亿左右。卢迈表示，“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关于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大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给出了三个指标：体量足够大，有足够的活力和对外开放，而只有美国、欧盟和中国符合这些标准。中国作为真正负责任的大国，要发挥优势，保持活力，同时要把经验、长处和投资带到其他国家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国才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能够保障收益。陈国才介绍，在高峰期，中建集团的海外收入曾经达到总收入的 30%。现在由于国内市场高速发展，国外收入的份额已经降到了 10%。但是由于海外投资的基数很大，绝对利润量增加得很快。

##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风险和政策建议

专家们分别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生态等角度归纳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

第一，暴乱和战争会给海外投资带来直接的打击。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巡视员唐和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项目险市场开发部

总经理陈新指出，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治安恶劣，驻外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地缘政治的风险十分突出，直接影响到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收益，比如利比亚战争和越南暴乱。

**第二，经济形势变化会威胁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收益。**周振成指出，如果国际油价下跌，单纯以石油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国家的未来还款可能存在风险。

**第三，海外投资的风险与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生态和法律调整密切相关。**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作业务局副局长宋磊指出，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涉及亚非拉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存在投资环境不熟悉、东道国的法律体系不完整，政府部门存在腐败现象等问题。加之我国企业尚未建立对海外市场的长期跟踪机制，因此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难以及时响应。唐和义指出，近年来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部分国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置了多种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安全壁垒，造成对外投资的障碍，有些已经达到刁难的地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晓星提到，墨西哥的高铁项目取消的直接原因是油价下跌，但深层原因还是政治因素，执政党迫于反对声音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了项目。周振成和赵晋平认为，法律经济政策的变化会对企业投资带来巨大的风险，比如欧洲的光伏项目和南非正在酝酿出台的外国投资法。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专家们分别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统筹考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收益。**陈晓星认为，铁路建设的投资大，回报期长，投资所在国所提供主权担保和财务担保也会存在风险。因此，必须把铁路建设和沿线的资源开发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效益的综合性。这就需要政府搭台，企业参与，共同开发某一个地区。赵晋平也表示，企业在境外的并购投资，不能过度地用是否赚钱来衡量其并购是否成功。只要通过全球资源的配置和组合，提高了品牌价值，取得了良好的溢出效果，获得了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这就是值得的。

**其次，从国际战略上讲，要将“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变成沿线各国的战略，把我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目标结合起来。**陈晓星指出，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和投资所在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解决就业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提高当地对我国投资项目的接受度。卢迈认为，目前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帮助它们实现这个理想，中国应当加强相关研究，把各国的利益需求和我国的优势整合在一起。

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府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陈新认为，在国际市场上，政府和市场要有所分工，政府更多的应该是制度建设，规则制定和搭好平台。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赵令欢表示，政策之下的市场化运作是风险管理和收益保障的最好做法。政府无法保护企业的投资收益，最终还是要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规范竞争。市场化主体由于有利益的追求，收购海外企业会很小心，这是极好的风险管理方法。

具体而言，政府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政府要在国际层面提供对我方有利的国际间协议和公约的法律框架，在国际层面加大对贸易壁垒的协调力度，为中国企业营造透明稳定的环境。**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军和宋磊建议，要建立更加系统、符合国际规范和我国国情的对外投资法，解决企业海外投资无法可依的局面，对重点国家、重点领域签署特殊的双边协定或协调机制，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投资合作对话机制。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商务部主任李甦指出，核电作为投资运营方，必须要准备好承担核电运营的第三方损害赔偿责任。要使核电企业走到国际市场当中，就必须快速有效地实现针对损害赔偿的法律框架与目标国的法律法规接轨。陈国才指出，政府与政府之间要达成投资保障协议，这对于企业规避投资所在国的政治法律风险十分重要。

**第二，要加强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指导，完善应对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唐和义和陈新建议，要加强对投资所在国税收、劳工、法律和社区管理等多项制度的研究，及时提出应对风险防范预案，开展境外重大经济合作项目风险排查，建立境外企业投资外源性风险管控的评价体系。周振成指出，政府有必要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进行指导和提示。商务部一直在发布对外投资的国别指南和国别风险评估、国别经营的障碍报告，让企业事先知道投资所在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要发挥好国家整体对外合作资源的协同效应，加快建立协同机制，整合我方资源，减少内耗。**郑军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资源分散、政出多门的问题。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或机构，整合各类资源，实现信息共享。比如可以将孔子学院和对外援助的医院引导到境外园区内，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建设，实现抱团投资、抱团经营，降低产业链的投资风险，提高园区在当地招商引资的知名度。陈晓星建议，要充分发挥驻外机构和华人商会的力量，避免中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第四，要大力推动中国的技术标准“走出去”。**陈晓星提出，在墨西哥高铁事件中，墨西哥认可的是欧洲铁路技术标准，而不接受中国的标准，因此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他建议，要加大收购兼并国际咨询机构，让它们把中国的铁路技术标准和欧洲的标准融合起来，让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接受。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总经理助理刘开新指出，中国核电的制造水平和技术标准目前还不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核电强国和新兴国家往往以技术标准、制造质量、核安全等为借口或手段提高准入门槛，制造垄断和壁垒，中国核电标准应当尽快与国际认证接轨。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开发与创新部总经理助理张天琴认为，如果包括铁路、公路、桥梁建设等中国施工技术标准能够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应用，这对于企业“走出去”的咨询服务会有很好的后续支持。

**第五，应该逐渐减少对投资国主权担保的需求，而要评估项目本身的现金流和收益情况，使企业走在前面，国家走在后面。**陈国才认为，主权担保是国家担保。当我们以国家的形式在国际上推动一些项目时，会在资本主义国家遇到很大的障碍，因为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竞争。国家应该更多地从前台走向隐性，从税收、法律、治理等方面进行支持，而不是贴上国家战略的标签。

**另外，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依法维权。**宋磊建议，企业应加强内部治理结构建设、风险管理和人才储备，制定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的海外发展战略。马骏认为，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根本出路是进行国企所有制改革；同时，国有

企业可以跟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联合投资，构建新的投资主体，取长补短，分散风险。周振成指出，企业要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环境、法律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评估，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

###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困难和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国有政策性银行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积极的金融支持。据宋磊介绍，截止到去年年底，国开行的总资产已超过 1.6 万亿美元，超过世行、亚行等国际著名开发机构的总和，业务覆盖 114 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据张天琴介绍，进出口银行支持的“走出去”项目近 2000 个，合同金额为 4300 亿美元。

然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普遍面临资金成本高和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问题。陈国才指出，从 2009 年以后，我国有 4 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是世界上拥有资金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现行的利率政策，我国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另外，由于人民币的长期升值和通胀，企业早期投资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

多位专家们表示，现有的金融服务难以充分满足企业海外投资的需要。唐和义指出，我国的优贷资金有限，主要支持的对象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同时，制造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申请难度大、周期长。另外，我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布局结构不合理，且境外分支机构贷款意愿不强，能力不足。企业对政策性银行的基金操作模式也还不够了解，难以申请支持。宋磊指出，企业“走出去”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及大型工程承包领域，具有融资额度大、期限长的特点。国内商业银行在消费型、短期出口信贷产品方面有丰富经验，但在满足大额中长期融资需求的方面有所欠缺。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专家们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政府应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直接融资的支持，积极运用投资基金。李甦指出，国家为了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了一系列的基金，比如中非发展基金、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像核电这种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风险偏高，还面临着在当地履行

社会责任、提高国际市场的公众接受度的挑战。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寻求运用好这类资金，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有优势的支持。赵晋平、李甦和陈国才建议，可以加大官方的金融支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提供贴息的政策性贷款，推动中信承保政策突破，给予项目税收优惠政策等。张天琴提出，政府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这样政府既可以分享企业对外投资的收益，也可以减轻企业还贷的压力。

政府应当推动金融改革，加大对金融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以更好地推动产业资本“走出去”。赵令欢认为，虽然我国有丰富的资金，但是运用资本作为杠杆，帮助实体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还不够。只有我国的金融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整合，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企业，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业。张天琴表示，国际市场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如果政府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海外融资，就可以降低中国企业的贷款利率。王跃生、赵晋平和马骏进一步指出，应当打破制度性和政策性的障碍，大力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市场改革，充分利用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提高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支持企业走产融结合的道路。

**金融机构要通过金融服务提升企业“走出去”的资金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陈国才建议，应该提升人民币结算业务，降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宋磊、郑军和陈新认为，金融机构要针对企业境外投资的需求，学习国际市场的融资模式，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比如可以将企业的海外资产作为信贷抵押物。张天琴建议借鉴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做法，加快构建我国海外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做贴身服务。赵晋平提出，要鼓励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唐和义建议，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企业的培训和指导，增强申请程序和规则的透明度，便于企业申请政策性银行基金；另外，要扩大优买优贷政策性贷款的资金规模，适度延长贷款年限，取消相关额度限制；同时，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扶持资金要适度向制造业项目倾斜。马骏建议，应放松金融管制，支持企业走产融结合道路。国内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是产融结合的，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本。我们国家由于过去长期的金融管制，企业没有金融能力。企业搞产融结合



并不是企业的融资都是自己搞，关键是企业提高利用全球金融资本的能力，特别是跟产业结合的金融能力。

**企业应与金融机构加强合作，积极拓展贷款资金的渠道。**李甦建议，我国核电企业应当与金融机构一起深入研究投资国特有的融资模式，加强与当地的银行机构或私人投资者合作，适应市场要求。唐和义提出，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申请亚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优贷资金。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张纯 整理）

---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中心 A 座 15 层  
电 话： (010) 64255855 邮 编： 100011  
传 真： (010) 84080850 网 址： [www.cdrf.org.cn](http://www.cdrf.org.cn)  
责任编辑： 任晶晶 电子邮箱： [renjj@cdrf.org.cn](mailto:renjj@cdrf.org.cn)

---